

国内族群政治背景下的埃塞俄比亚 与厄立特里亚关系探析

王益明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政策按照执政民族的不同可分为阿比西尼亚帝国时期的单一国族认同政策、门格斯图军政府时期的民族自治政策和从过渡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民族联邦自治政策。随着民族政策的推进与演变,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政治发展迅猛,形成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情况。埃厄两国关系由敌对到和解的转变反映了埃塞各届政府基于族群政治博弈下的政治重心由北向南的地域性转移。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埃塞俄比亚当前的国家安全重心逐渐由保证领土安全转向维护国内政治稳定。民族自治政策下埃塞俄比亚国内各民族激化的政治诉求在埃厄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关键词】 族群政治;埃厄关系;民族政策

【作者简介】 王益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9)。

地处非洲之角地区的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或“埃塞”)与厄立特里亚(以下简称“厄”)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安全局势。历史上,埃厄两国关系复杂,总体上经历了多次分合。

公元 2 世纪至 9 世纪,厄立特里亚是作为阿克苏姆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存在。随着阿克苏姆帝国的衰落和邻近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扼守红海咽喉的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在 16 世纪遭奥斯曼帝国侵占。1869

年,随着意大利殖民者的到来,厄经济与工业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建立了一套相对现代化的行政体系,整合了原本较为分散的境内各族群。相比于当时仍属于封建农业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具有更多现代国家认同。二战后,在英美等国的推动下,联合国为满足埃厄双方需求作出了将埃厄合并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决定,但海尔·塞拉西一世仍强行在1962年将厄划为埃塞的第14个省,并对厄立特里亚反抗活动采取武力镇压,此举激化了厄人民对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强烈诉求。此后,门格斯图军政府依然延续了对厄强硬政策,依然坚持对厄立特里亚的主权要求。于是,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厄人阵”)借埃塞国内民族问题尖锐之际,以独立建国为条件与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提人阵”)等埃塞反政府武装合作成立联合战线,推翻了门格斯图军政府统治。1993年厄立特里亚举行全民公决正式独立,但埃厄边界划分问题始终悬而不决,埃厄两国因边境牧地划分、出海港使用权等问题所引起的双边冲突频繁发生,双边关系长期低迷,直至1998年爆发埃厄战争。争论焦点在于:埃塞坚持以1962年塞拉西所划厄立特里亚省界作为厄立特里亚共和国国界;厄方坚持认定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划分的厄立特里亚边界为合法国界,并收回阿萨布(Assab)等出海港的主权。

自2000年停战后,两国长达近20年的不战不和(no war no peace)状态是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的一大变数。2018年埃塞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简称“阿比”)上任,埃厄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本届政府的重要议题,为此阿比政府不断向厄政府释放和平信号。2019年,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结束了多年“不战不和”的紧张状态。这一和平成果不仅与埃塞新一任总理阿比为推动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有关,而且与埃塞各届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表现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个联邦议会制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政党多以族群政党的形式进行政治活动。因此,本文认为,埃塞俄比亚最终放弃长期以来对厄敌对的态度,主动向厄方抛出橄榄枝并实现和解并非偶然,是以阿比为代表的埃塞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中的奥罗莫族力量在进行了国内外各层利益权衡之后所做出的谨慎选择。

一 埃塞俄比亚民族政策演变与族群政治的发展

作为一个拥有3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阿克苏姆(Aksum)王朝文化的发源地,埃塞俄比亚拥有较为复杂的民族结构。目前埃塞俄比亚官方认定其境内共有80余个民族,其中奥罗莫族(Oromo)为第一大民族,其次是阿姆哈拉族(Amhara)、提格雷族(Tigray),这三大民族由于人口占比较高,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还拥有索马里族(Somali)、锡达莫族(Sidamo)等多个民族,其民族种类繁多且语言、文化差异较大。^①但是在门格斯图军政府执政之前,埃境内各民族多以和谐相处的形式共同生活,除奥罗莫人反抗埃政府“内殖民”的多次抗争外,^②民族间有组织的大规模冲突少有发生。近年来,随着埃塞俄比亚各民族认同的加强,各民族政治利益诉求不断增多,以民族为划分依据所组建的政党活动逐渐积极,自身民族利益成为埃执政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埃塞俄比亚族群政治的发展与埃各届政府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政府性质的不同,可将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政策划分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帝国时期的单一国族认同政策、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军政府时期的民族自治政策和从过渡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民族联邦自治政策。

在阿比西尼亚王朝时期,埃塞俄比亚主要奉行单一国族政策,在此期间,以阿姆哈拉族为核心的领导阶层通过将阿姆哈拉语定为国语、禁止使用其他民族语言等在非阿姆哈拉地区强制实行阿姆哈拉化等方式,将阿姆哈拉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淡化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使非主流民族文化不可延续。这样一种“内殖民”式的“专制同化”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阿比西尼亚统治集团维持其国家疆域范围有所帮助,并推动了西方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产生。^③但是,统治者的这一政策并未有效抑制各民族对身份的强烈认同,反而刺激了各民族尤其是南部奥罗莫

① 钟伟云编著《列国志:埃塞俄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6—7页。

② 钟伟云编著《列国志:埃塞俄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62—64页。

③ 施琳、牛忠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24—25页。

族等民族对阿姆哈拉人的不满情绪，长期被阿姆哈拉人视为奴隶的奥罗莫人就此爆发了多次抗争。

1974 年门格斯图军政府执政后吸取帝制统治时期单一国族政策的教训，将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视为其政治统治的第一要务，同时，军政府积极借鉴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在强调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实行地方自治主义（Hebretesebawinet）。^① 具体而言，军政府建立了“埃塞俄比亚民族研究所”，基于“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历史、共同区域和有限的经济自治”四方面的标准，在埃塞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识别”运动，先后识别出 70 余个民族，根据民族自治的成果，军政府参考苏联、中国在处理多民族共存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在 1987 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埃塞民族的多样性、各民族平等的地位，鼓励各民族发展各自的文化、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同时，军政府秉持社会主义共有的平等、公正、合作的理念，将更多非阿姆哈拉族人士招入政府部门进行工作。在军政府地方自治主义的助长下，埃塞国内各民族认同增强，由于军政府在土地改革等具体措施上对部分民族聚居地的强行国有化，埃塞国内以“厄人阵”、“提人阵”、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以下简称“奥民组”）为代表的各大民族政治组织相继成立，各民族所领导的政治活动以民族认同为纽带逐渐从村社向民族地区扩散。^② 最终在以厄人阵、提人阵为代表的民族武装联手合作下，门格斯图军政府独裁统治结束，但其推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对其后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政府下的各民族政党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可忽视。

1991 年由提格雷族、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等 20 余个民族武装联合成立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以下简称“埃革阵”）成功从军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并成立了过渡政府。武装革命的成功不仅代表着门格斯图军政府的倒台，还代表着埃塞俄比亚统治阶层民族从阿姆哈拉族到其他民族的转变，一直以来被政治边缘化的提格雷族和奥罗莫族开始进入政治舞台。出身于提格雷族的领导者梅莱斯（Meles Zenawi）在其上任之初就面临着国内各民族高涨的民族意识与争取民族平等的诉求，鉴于之前各届政府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败，埃革阵政府一方面继续军政府时期的基于斯

① 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 70—72 页。

② 钟伟云编著《列国志：埃塞俄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 73 页。

大林对民族的定义的民族识别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按照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对各民族地区进行联邦划分，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和保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与权利。

1994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将奉行“在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纳入其中。根据宪法规定，埃塞根据各民族聚居的情况对行政区作了重新划分，将省改为行政区，随后于1995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又对区划作了调整，按照当地多数民族的原则将全国划为9个州和2个特别市。在联邦框架下的各民族州享有包括分离权、立法权、行政权、确定各州工作语言在内的高度自治权。为照顾各民族利益，宪法规定在内阁、人民代表院、政府部门中以人口比例的原则进行职位分配，逐渐改变长期以来阿姆哈拉人独揽一切的状况。根据埃塞俄比亚1993年颁布的《政党登记法》，政党可按全国性政党、地区性政党两大门类进行登记，各民族政党建设也在联邦政府成立后实现较快发展。^①

自过渡政府开始埃塞俄比亚所推行的民族联邦自治政策在实现政权稳定的同时平衡了各民族利益，以实行联邦制的方式满足了各民族政治利益的表达，以认可民族政党的方式促进了各民族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民族联邦自治政策的推行使得埃塞国内各民族政治实体合法化，埃塞国内各民族对自身族群的认同加深，国族认同被削弱，南方民族对自身长期以来被“内殖民”、剥削的劣势地位而产生的不满中央政府的情绪加重，埃塞国内民族政治逐渐实体化、碎片化。另一方面，实行民族联邦制更加强调了埃塞俄比亚各民族认同的差异性，对于人口较少但处于领导阶层的提人阵维持其统治、防止各主体民族达成共识挑战现有政权提供了有效的空间。

然而，从整体格局看来，埃塞俄比亚国体的几次改变并没有带来地区势力之间的平衡，中央政府仍一直持续推行其以北方为重的发展战略。由于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在埃革阵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埃塞政府多将政策重心置于北部提格雷州、阿姆哈拉州和2个特别市，并支持成立提格雷人生产修复捐赠基金会（Endowment Fund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igray, EFFORT）来发展北部提格雷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工业，而忽略了

^① 施琳、牛忠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26—28页。

在历史上多处于劣势地位的南部各民族的需求。^①例如在1995年划分民族州时埃塞政府无视南方奥罗莫族的传统分布情况,将部分奥罗莫族划分至其他民族州管辖范围内,这一现实情况也助长了奥罗莫解放阵线(以下简称“奥解阵”)等分离主义势力力量的增强。除此之外,赋予各民族州过多的权力也催生了埃塞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比如散布在各民族州内的其他民族遭遇的“民族清洗”现象,过于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代表着埃塞各民族对国家认同感的下降,埃塞作为一个国家主体的立足之本正在受到各民族力量的挑战。

二 “以北为重”:梅莱斯执政前期的埃厄关系

梅莱斯作为“提人阵”的核心领导人物,在推翻门格斯图军政府的革命战争中与厄立特里亚以伊萨亚斯为首的“厄人阵”长久以来保持着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埃塞过渡政府成立之初就承诺将在厄立特里亚人民公决通过的情况下支持厄立特里亚独立。因此在1993年厄立特里亚独立前期,埃厄双方曾度过一段蜜月期,双方在阿萨布等港口主权归属上虽未达成一致,但承认埃塞俄比亚可拥有马萨瓦(Massawa)、阿萨布两处港口的使用权,避免埃塞陷入彻底沦为一个内陆农业国的窘境,而厄立特里亚人民所食用的传统农业作物大多生长在埃塞俄比亚,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推动两国在厄独立后迅速签署了《友好合作协定》,高层往来频繁并结成货币联盟。^②

然而,同为多民族国家,两国所奉行的民族政策却大相径庭。埃塞的民族联邦自治制度赋予各民族州包括分离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力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而厄立特里亚政府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民族通婚、杂居等情况在厄境内普遍存在,人民多以厄立特里亚国民的身份进行认同。因此,相比于厄立特里亚人民,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国家认同远低于族群认同,因此在梅莱斯临时政府成立后,以南部地区的奥

① “EFFORT Emptied Development Bank of Ethiopia”, Abebe Gellaw, February 5, 2010, <http://www.solidaritymovement.org/downloads/100205EffortEmptiedDevelopmentBank.pdf>.

② G. J. Abbink, “Law against Reality? Contextualizing the Ethiopian-Eritrean Border Problem”, *The 1998 – 2000 War between Eritrea and Ethiopia : An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pective*, 2009, pp. 141 – 158.

解阵、欧加登民族解放运动(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以下简称“欧解运”)为代表的各民族武装力量退出临时政府,在南方各州引发骚乱、不承认梅莱斯当局,但这一系列活动都遭到了埃塞当局的武力镇压。^①相比南部地区方兴未艾的分离主义暴动,以阿姆哈拉州和提格雷州为首的北部地区的发展与国土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以提人阵为首的埃塞联邦政府执政初期的核心利益,埃厄政府在边境问题上的悬而不决限制了以游牧业为主的提格雷族人的发展,尽管梅莱斯政府在1993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大力推动了埃塞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但受制于作为一个内陆国的实际情况,埃塞俄比亚的国民经济仍然发展缓慢,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93年埃厄分家以来,埃塞俄比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走低,而厄立特里亚因为拥有良好的、继承自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和红海西岸狭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港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独立以来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②经济发展差距使得梅莱斯政府在国内受到了以提格雷族为首北部势力的批评与指责,后者对梅莱斯政府就厄立特里亚独立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表示失望。

在民族联邦自治政策推行伊始的背景下,埃塞国内各政治实体之间的矛盾并未明显爆发,大体上各民族政党仍处于以人数较少的提人阵为核心的埃革阵的伞状政治结构下,为了保证国内民族政治的相对稳定、加强国力建设,梅莱斯政府通过发动对外战争的方式强化埃塞国族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莱斯政府在执政初期主要采取了“以北为重”的族群政治偏好。具体行为方面,梅莱斯政府于1998年联合边境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强行将北部巴德梅等争议地区划入提格雷州地图内并引爆埃厄战争是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提格雷族群内部诉求。巴德梅附近的4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可为提格雷人游牧提供广阔的空间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第二,国内经济发展的诉求。厄立特里亚在其独立后仍使用埃塞货币比尔,因此厄巧妙地利用两国物价差异将进口的埃塞物资转手卖给第三国以赚取外汇,造成埃塞市场物资短缺,梅莱斯政府试图通过发动战争的形式增加税收并进行大规模工业和人力动员,加速埃塞国内经济发展。第三,淡化民族矛盾,维持提人阵政权的稳定。如上文所

① 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94—95页。

②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 Ethiopia & Eritrea, World Bank,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ET-ER>.

述,此时的埃塞政府在国内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上存在以北为重的政策倾向,南部奥罗米亚等地抗议冲突时有发生,但都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并受到当局的及时镇压,为强化国族认同,巩固在民族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的提人阵政权,与国土面积相比更小、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厄立特里亚进行一场有把握的战争有助于埃塞国内各民族的凝聚、加强国族认同、强化提人阵对国家的组织与管理、淡化埃塞人民对提格雷人掌权的反感。^①

在埃厄战争期间,梅莱斯政府通过教育、宣传的手段,将厄立特里亚的进攻比作意大利殖民主义侵略的延续,埃塞官方形容的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这场战争得到了国内各民族州在人力和财力上的积极支持,增进了国家的团结。^② 2000年在双方大量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于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将由独立的边境委员会(Eritrea-Ethiopia Boundary Commission, EEBC)于2003年裁定两国边境,埃塞在战争中占有相对优势,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仍保持着巴德梅周边地区的实际控制权。^③ 战争胜利为梅莱斯领导的提人阵赢得了国内局势的暂时稳定和更广泛的民众支持,在2000年举行的埃塞俄比亚全国大选中,梅莱斯率领的埃革阵赢得人民代表院中的多数席位,继续执政。^④

在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联邦独立建国至埃厄战争结束的这一时期,提人阵出于对其传统利益、国内执政安全、国家边境安全的考虑,对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政治主要侧重于北方与厄立特里亚接壤最多的提格雷尼亚地区。提人阵通过领导埃塞对厄发动战争的方式,淡化了民族自治政策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不利影响,巩固了其在埃塞国内政坛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敌对的两国关系加强了埃塞国民的国家认同,淡化了南部奥罗莫族等民族的分离主义暴动,保障了埃塞国内局势的安全。

① [美]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12—222页。

② 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105页。

③ 肖玉华:《埃厄边境争端与非洲之角的地区安全》,《非洲研究》2010年第1卷,第160—161页。

④ Merera Gudina,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thiopia, 1991–2010”,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5 (4), 2011, pp. 664–680.

三 “南北并重”：梅莱斯执政后期的埃厄关系

以埃厄战争结束作为节点,此后直至2012年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Hailemariam Desalegn)上台的时期可视为梅莱斯执政后期,因为在这段时期梅莱斯政府对厄关系较为反复,虽时有小规模冲突产生,但大体上仍保持着“不战不和”的状态。相比北部边界地区的长期僵持对立,埃塞南部各民族反对派势力的扩张逐渐影响到埃革阵的执政安全,因此,在这一时期,梅莱斯政府逐渐重视埃塞国内族群政治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埃塞国内族群政治开始呈现“南北并重”的局面。

在梅莱斯政府赢得2000年埃塞大选、顺利实现连任之后,埃塞国内的民族问题再次凸显,其围绕的主要问题是梅莱斯政府在2000年同厄方签署的《阿尔及尔和平协议》(Algiers Agreement),双方在协议中商定阿萨布港的主权归厄立特里亚所有,巴德梅周边争议地区的归属由边境委员会裁定。^①对此,埃塞国内临近出海口的各州人民抱有强烈不满,其中东部阿法尔族(Afar)、索马里族的不满情绪最为激烈。^②同时,埃革阵及其核心成员组织提人阵内部均出现派系分化,2001年,以提沃尔德为首的“默克雷派”在提人阵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梅莱斯对厄过度迁就、放弃出海口、无视埃塞国内实际需求。战后厄立特里亚经济、人口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厄方伊萨亚斯政府在领土划分等与埃塞仍存争议的问题上坚持按照殖民时期的领土划分、沿海港口主权归厄方所有的原则,但梅莱斯政府对此无意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更侧重于国内经济的恢复、政权的稳定等国内工作。同时,在民族联邦自治政策和厄立特里亚独立的影响下,埃塞各民族政治实体化进程逐渐加快,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等民族开始利用选举、舆论宣传等方式威胁提人阵的政治地位,甚至根据《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中各州可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独立的规定提出从联邦分离的要求,埃国内民族问题迅速激化。综上,梅莱斯政府此时面临的来自国内各民族势力和自身民族内部的执政危机高于外在威胁。在2001年提人阵中

①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December 13, 2000,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ER%20ET_001212_AgreementEritreaEthiopia.pdf.

② 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105—106页。

央委员会会议后，梅莱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平息提人阵内部民族矛盾，并在埃革阵内部发起“自我革新”运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打击腐败的名义解职多名持异见的其他民族代表，但与其预期相反，埃塞各民族内部的反对党力量迅速壮大。同时，梅莱斯政府提出“发展型国家”理论，重点发展埃塞国内农工业、抑制通货膨胀，在 2005 年起提出三个“五年计划”，力求在任期内实现埃塞经济复兴，提升执政合法性。

2005 年举行的埃塞全国大选结束后，反对党对埃革阵又一次取得压倒性的选举胜利结果表示质疑^①，对埃革阵操纵选票的行为公开表示反对，并在各民族州展开学生运动、街头游行等抗议活动，引起埃塞国内社会骚乱。在民族政党诉求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当局对反对派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将很多异见分子关押入狱，造成奥解阵（奥罗莫族）、金伯特 7 日（阿姆哈拉族）的反对派民族政治组织利用海外资金与宣传迅速发展壮大。国内各民族反对势力的壮大和各民族势力内部就对厄关系走向上产生的分化，促使梅莱斯政府对 2007 年联合边境委员会裁定结果仅表示反对，虽在边境进行驻军，但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同时，梅莱斯考虑到厄立特里亚在埃厄战争中国力受损严重，不足以再次发动战争，因此，长期维持“不战不和”的双边关系是梅莱斯政府继续维持其提格雷人领导地位，缓和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矛盾的最佳方案。^②这一时期以提人阵为核心的埃塞执政党埃革阵受制于国内各族群反对派力量和国民的发展需求，逐渐将政治重心南移，但由于与厄立特里亚在港口使用和边界划分问题上仍存在原则性分歧并出于维护提格雷族利益、保持提人阵内部团结的考虑，埃塞当局无意与厄就结束战争达成妥协，埃塞国内族群政治呈现“南北并重”的局面。

四 “向南侧重”：海尔马里亚姆执政期间的埃厄关系

2012 年梅莱斯在比利时因病去世后，来自埃革阵下属南方阵线的少

① G. J. Abbink, “Discomfiture of Democracy? The 2015 Election Crisis in Ethiopia and Its Aftermath”, *African Affairs* 105 (419), 2006, pp. 173 - 199.

② “The Ethiopia Eritrea No War No Peace Situation Has to End”, Asmarino, March 15, 2014, <https://www.asmarino.com/articles/2041-the-ethiopia-eritrea-no-war-no-peace-situation-has-to-end>.

数民族沃莱塔族(Wolayta)政客海尔马利亚姆的上任引起埃塞各界人士的关注,究其原因,作为族群政治中的少数派海尔马利亚姆的履职实则是埃革阵在2010年政府调整时基于稀释民族矛盾做出的决定。^①在2010年埃塞全国大选期间,各反对派和西方政府纷纷指责提格雷人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这一背景下,埃革阵选择来自南方民族州并一直以来与提人阵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尔马利亚姆作为继承人既可以保证南部民族地区的相对稳定,同时也可继续保持埃革阵和提格雷人的政治地位。海尔马利亚姆政府在对厄政策上延续了梅莱斯政府提出的“不战不和”的总方针,但结合其具体政治主张与国内族群政治不断激化的形势,海尔马利亚姆政府也多次在厄厄边境作出挑战性举动,埃厄关系与梅莱斯政府后期相比变得更加不稳定。^②但从这一时期开始,埃塞国内族群政治斗争的核心已逐渐转到南方奥罗莫族等民族因为无法在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满足自身族群的发展需求、保障族群合法权益而爆发的大规模冲突等问题上,北部矛盾因为提格雷人政治实力的相对弱化和厄立特里亚在两国关系中逐渐变得被动而让位于南部激烈的族群斗争。

上任初期海尔马利亚姆政府对内政策较为温和、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在对与厄进行和平对话方面持开放态度^③,这与海尔马利亚姆自身曾经在欧美国家留学期间产生的理想主义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随后埃厄关系因厄方为在埃塞国内奥罗米亚州制造混乱、煽动分裂建国的奥解阵提供政治庇护一事急转直下,埃方于2012年多次指责厄支持埃塞反对派武装后向位于厄境内的多处“反动堡垒”进行空袭。海尔马利亚姆政府上任后对厄政策的逐步强硬有利于作为政治边缘力量的南方阵线获得以提人阵为核心的埃革阵的足够信任,巩固了海尔马利亚姆在执政党内的地位。^④

2014年海尔马利亚姆提出《亚的斯及环亚的斯总体发展规划》(Addis Abeba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该方案旨在解决人口不断

① 肖玉华:《“后梅莱斯”时代,埃塞将接受大考》,《社会观察》2012年第10期,第64页。

② 简练:《埃塞俄比亚2018年剧变的来龙去脉、前景展望、对中国人群体的影响及对策》,2018年11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bm4H5ZBZa54xRaEKQgiFVg>。

③ “Ethiopia PM Willing to Talk to Eritrea”, Al Jazeera, December 6, 201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2/12/6/ethiopia-pm-willing-to-talk-to-eritrea>。

④ 王磊:《“非洲的柏林墙”倒塌了——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关系转圜》,《世界知识》2018年第15期,第50—51页。

膨胀的首都地区严峻的住房问题,以强制征收首都地区周边奥罗米亚州人民土地的形式扩张首都面积^①,但引发首都周边奥罗米亚州人民强烈抗议,在政府的强行镇压和奥解阵的煽动下,奥罗莫人迅速将此事由民生问题升级到民族问题,奥罗米亚跳出国家框架而独立的分离主义思潮开始凸显。为平复奥罗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海尔马利亚姆当局承诺为被征收土地的奥罗米亚公民提供政府住房,同时,海尔马利亚姆政府同意开放媒体、允许言论自由。针对愈演愈烈的奥罗米亚独立建国思潮,海尔马利亚姆政府尝试再次利用国内的反厄情绪强化国族认同,自2012年埃厄边境冲突以来,埃厄关系始终处于战争边缘的状态。海尔马利亚姆政府虽然在2015年大选中成功连任,但因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各民族利益未兼顾等问题饱受指责。2016年海尔马利亚姆政府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以维护领土主权的名义在索罗纳地区对厄发动的自埃厄战争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实质上是其为缓解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无奈之举。^②但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无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和联合国等国际力量的限制,这次的军事对抗并未扩大为全面战争,海尔马利亚姆政府此举对于缓解国内民族分裂主义问题收效并不明显。由于海尔马利亚姆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处理不力,各民族政党内部分化更加复杂,埃革阵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这也造成了2018年海尔马利亚姆的主动请辞。^③

在海尔马利亚姆执政后期至阿比政府上台之前,埃塞国内政治环境较为混乱,大量海外流亡人士陆续获准回国,政治异见人士得到释放^④,在政府政策逐渐宽松和民族自治政策的影响下,以提人阵为核心的埃革阵内部各民族组织力量迅速膨胀,奥民组与阿民运纷纷改组为党,分别建立奥罗莫民主党(Oromo Democratic Party,以下简称“奥民党”)和阿姆哈拉民主党(Amhara Democratic Party,以下简称“阿民党”),开始在

① “Why Resist the Addis Abeba Master Plan? – A Constitutional Legal Exploration”, Addis Standard, August 20, 2015, <https://addisstandard.com/why-resist-the-addis-abeba-master-plan-a-constitutional-legal-exploration>.

② “Heavy Fighting Reported along Ethiopia-Eritrea Border”, VOA, June 13, 2016, <https://www.voanews.com/africa/heavy-fighting-reported-along-ethiopia-eritrea-border>.

③ “Ethiopia's Prime Minister Resigns”,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18/02/15/ethiopias-prime-minister-resigns>.

④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Ethiopia-too Good to Be True?”, ECADF, January 12, 2018, <https://ecadforum.com/2018/01/12/the-release-of-political-prisoners-in-ethiopia-too-good-to-be-true>.

埃革阵中扮演与提人阵拥有同样权力的角色^①，这为阿比政府上台以来在国内外事务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这一时期埃塞国内各族群对执政党的威胁程度已明显高于埃厄冲突，族群政治重心开始出现南重北轻的倾向，埃当局已难以利用人民的反厄情绪强化国族认同，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等多个民族的反对政党已严重威胁提人阵的执政安全和传统优势，埃厄关系尽管仍有反复但还不至于威胁埃塞国家领土完整与以提人阵为首的埃革阵的执政安全。相比之下，跳出自治框架的南方奥罗米亚州等地的分裂主义运动不仅干扰了埃塞国家安全稳定，同时也阻碍了埃塞经济的快速发展，埃塞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本质受到严峻挑战。在此期间埃厄在边境上的几次冲突规模均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海尔马里亚姆政府为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强化国族认同所采取的政治手段，埃厄关系虽有反复，但已不再是干扰埃塞政府执政安全的首要威胁。

五 “以南为重”：阿比上台以来的埃厄关系

2016年奥罗米亚州选举产生地区领导人勒玛(Lemma Megersa)，同时，南部奥罗莫族等民族逐渐走向政治实体化、合法化的道路，南部民族的政治实力逐渐强大与提格雷人政治地位的迅速下降，再加上奥罗莫族强大的人口基础，使埃塞国内政治重心南移。彼时，因为政治方针的不同，奥罗莫族内部开始呈现复杂的党派分化，南部族群政治由族群间矛盾转化为族群内部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埃塞国内族群政治总体呈现“以南为重”的局面，长期僵持的埃厄关系在这一时期迎来和平解决的契机。

在勒玛等人的努力下，南部奥罗莫人的政治诉求不断得到实现，勒玛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不断强调各民族州的利益，提出禁止联邦警察插手各州事务、落实各州在宪法上规定的合法权利，加强各州对内部事务的监管职能。同时，在提人阵在埃革阵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的情形下，勒玛开始着手调整奥民组内部结构、更换大量官员，改变奥民组一直以

① 简练：《埃塞俄比亚2018年剧变的来龙去脉、前景展望、对中国人群体的影响及对策》，2018年11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bm4H5ZBZa54xRaEKQgiFVg>。

来的附属地位,在不断加强奥民组实际政治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奥罗米亚州人民的支持,对传统民族势力奥解阵在奥罗米亚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

出于个人身份原因,勒玛于2018年埃塞大选前将奥民组主席让位于阿比,并对外宣布全力支持阿比参加大选。自2018年阿比成功当选埃塞总理以来,他以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作风赢得埃塞国内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的支持。阿比政府与之前各届政府相比更加注重民生与经济共同发展,并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名义颁布废除恐怖主义组织法、与各反对派进行会面、对埃塞政府内部进行改组,压缩提格雷人在内阁中的影响力,与埃塞国内另一大民族阿姆哈拉族保持密切来往、保持主流民族关系的稳定性,并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在对外招商引资等方面采取南部优先的政策偏好,因此遭到提人阵中强硬派和一直以来鼓吹奥罗米亚独立的奥解阵的敌视。从2018年6月集会期间由提人阵与军方强硬派预谋发起针对阿比的刺杀活动中可看出,由于传统政治利益被颠覆,提格雷人对阿比政府的不满情绪已开始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

在2018年9月奥民组改组为奥民党之后,奥罗莫族群内部分化加剧,以阿比为首的奥民党坚持国家先行、各主要民族利益兼顾的原则在首都地区开发等问题上采取的暧昧态度遭到奥罗莫族群体内以奥罗莫青年组织(Queeroo或Oromo Youth)为首的激进派的反对。自2019年起在首都周边奥罗米亚州引发的多起奥罗莫人反抗征地的骚乱中,脱离奥民党的新兴政治实体奥罗莫青年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阿比政府在其传统族群势力范围的威望正在受到来自其内部不断分化的各政治实体的挑战。同时,随着提格雷人政治地位的下降和各大民族利益集团的改制与分化,埃塞西部与南部多州内部民族矛盾激化,如古木兹(Gumuz)族等小型民族群体开始在其族群势力范围内对其他民族进行驱赶,借助民族联邦自治政策呼吁脱离原州管辖,成立新的民族州。^①除此之外,阿法尔州军阀势力扩张的事实以及提人阵强硬派主张的分离主义思潮的抬头,阿比政府深陷国内各大民族群体挑战国家框架、各自为营的难题。^②同

① “Tens of Thousands Flee Benishangul after Oromia Border Dispute Flares”, Addis Abab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ethiopia-insight.com/2018/10/04/tens-of-thousands-flee-benishangul-after-romia-border-dispute-flares>.

② “Abiy Ahmed’s Reforms Have Unleashed Forces He Can No Longer Control”, Addis Ababa, July 4,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7/04/abiy-ahmeds-reforms-have-unleashed-forces-hecan-no-longer-control-ethiopia-amhara-asaminew-adp-adfm>.

时,自2018年以来,埃塞南部各民族发展落后、基本人权难以得到满足的现实开始获得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南方问题直接影响埃塞政府的国际声誉与执政基础,调和南部矛盾、实现南部稳定发展成为阿比政府执政期间面临的首要任务。^①

相比国内严重的族群危机,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状态下的厄厄关系对阿比政权的威胁相对较小。同时阿比政府更强调国民幸福感、国家经济等国家民生、发展问题。2019年爆发的军人因待遇问题逼宫总统府一事让阿比意识到当前埃塞国内民生问题的严峻性,而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更有助于阿比政府缓解持续加剧的国内矛盾,避免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同时,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伊萨亚斯自战争结束后就多次因控制国内言论自由、一党专政等问题饱受国际社会指责,战争给厄立特里亚带来的破坏使其“元气大伤”,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被动防守的姿态,营造和平良好的双边关系逐渐成为两国当局的共同需求。^②所以阿比在2018年4月发表就职演说时对厄发出的和解信号迅速得到阿斯马拉政府的积极回应^③,不同于往届政府,阿比政府在履行2000年签署的停战协议和2002年的联合国裁决结果上主动做出让步^④,承认裁决结果并承诺主动从巴德梅等争议地区撤军。随后两国首脑迅速展开互访,并于2019年7月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厄关系正常化不仅将为埃塞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还可以根据国际判决结果,让埃塞重获位于厄境内的出海口,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有助于埃塞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阿比政府放弃对巴德梅等地区的占领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提格雷人的传统利益,虽然提人阵在埃塞国内政治改组后的政治权力大不如前,但提格雷族的民族激进分子、分裂主义势力与提人阵强硬派在阿比上台后

① “Ethiopia: Police Unit Unlawfully Killing People Must Be Stopped”, Addis Ababa,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5/ethiopia-police-unit-unlawfully-killing-people-must-be-stopped>.

② 简练:《埃塞俄比亚2018年剧变的来龙去脉、前景展望、对中国人群体的影响及对策》,2018年11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bm4H5ZBZa54xRaEKQgiFVg>。

③ “Isaias Afwerki Decides to Send Peace Delegation to Addis Ababa”, Addis Ababa, June 20, 2018, <https://mereja.com/index/222868>.

④ “Ethiopia Has Taken an Unexpected Step towards Peace with Long-time Enemy Eritrea”, Addis Ababa, June 6, 2018, <https://www.kimpavitapress.no/ethiopia-has-taken-an-unexpected-step-towards-peace-with-long-time-enemy-eritrea-by-abdi-latif-dahir>.

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阿比以牺牲提格雷人利益为代价换取和平发展空间的行为,激起了提格雷州多起抗议示威活动,直接引发2019年6月针对阿比的刺杀。但是,与逐渐式微的提格雷民族势力相比,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实现经济与民生共同快速发展更有助于稳定阿比政府当前面临的国内乱局。阿比在2019年11月底采取合并埃革阵及附属政党、成立繁荣党(The Prosperity Party)的举措,进一步改变了各族群势力在执政党中的结构,扩大了各民族政党的政治权力,巩固了多民族联邦制,并有助于以民族团结为基础将埃塞建设为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①然而,繁荣党的成立进一步压缩了提人阵的权力与政治活动空间。事实证明,提人阵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埃厄关系的改善极其敏感。2020年11月爆发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冲突,正反映出提人阵与繁荣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埃厄关系逐渐改善的背景下,提人阵的宣战从侧面加强了埃塞联邦政府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和平关系,厄政府表示将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安全与稳定提供帮助,亦在埃厄边境地区部署军队对抗提人阵武装力量。^②在一定程度上,此次提格雷州冲突促使了埃厄两国政府关系的迅速升温。

结 论

纵观埃塞俄比亚民族政策演进历程可知,伴随埃塞俄比亚国家转型与改革进程的发展,埃塞俄比亚各民族正在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自主权,根据民族政策划分的各民族州和各大民族政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国家认同、增强了其自身族群认同。厄立特里亚的独立刺激了各民族分离主义者寻求更大政治自主性的诉求,在埃厄分家到双方交恶再到当前两国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各民族政治力量出于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考虑,在埃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Morris Kiruga, "Abiy Ahmed Paddles Ethiopia's Prosperity Party towards Elections", *The Africa Report*, March 5, 2020,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24227/abiy-ahmed-paddles-ethiopia-as-prosperity-party-towards-elections>.

② "President Isaias Afwerki: 'It Is Our Duty to Provide Help to Ethiopia'", *Asmarino*, February 20, 2021, <https://www.asmarino.com/news/5277-president-isaias-afwerki-it-is-our-duty-to-provide-help-to-ethiopia>.

从根本上而言, 民族自治政策的推行促进了埃塞国内各民族自身认同的觉醒与成熟, 伴随各民族政治实体化的进程, 以人口数量不占优势的提人阵为核心的埃塞政府受到挑战。埃厄战争的爆发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暂时保证了埃塞国内民族政治的稳定, 维护了埃塞领土安全与国家发展。但伴随埃塞国内发展政策与奥罗莫族等民族之间矛盾的凸显, 原先政治权益受到剥削的南部各民族逐渐利用《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影响埃塞国内政局、挑战提人阵的领导地位, 甚至通过社交媒体等舆论渠道鼓励分离主义运动。相比之下, 埃厄边境冲突冷淡化的现实预示着两国仍存在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空间, 在两国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 埃厄关系正常化已是两国共同需求, 妥善处理南方奥罗莫人的利益诉求, 维护埃塞国家经济在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中稳健发展、抑制奥解阵等反对派组织试图通过强化族群认同、分裂埃塞国家的活动已成为埃塞政府在新时期内面临的更为严峻的考验, 埃塞国内族群政治的地域侧重逐渐实现了由北向南的转移。

【责任编辑】 宁彧

to the ICC itself has no executive power, Al-Bashir is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Sudan, and the non-cooperation of some ICC members, the arrest warrant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In April 2019, Al-Bashir's regime collapsed in the continuous wave of public protest, which made the execution of the arrest warrant for Al-Bashir a turning point. At present, all parties in Sudan have no intention or ability to prevent the ICC from prosecuting Al-Bashir's "crime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promote the domestic peace process and ease the external pressure,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Sudan is likely to transfer Al-Bashir, which has been the target of public criticism, to the ICC for trial.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of Arrest for Al-Bashir; Sudan; Darfu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opian Ethnic Politics

Wang Yiming / 52

Abstract: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ethnic policies in Ethiopia can be conclu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which are the single nationality policy pursued by the Abyssinia Empire, the ethnic autonomy policy pursued by the Mengistu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the ethnic federalism & regional autonomy polic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Ethiopia, according to the disparities in the ruling ideas held by the ethnic groups in power. With the progres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thnic policies, the ethnic politics in Ethiopia burgeons rapidly in which the ethnic identity surpasses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contex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hange of its diplomatic relation towards Eritrea is the reflection of its transition in regional political balancing based on the ethn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decided by the Ethiopia government. As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Ethiopia's national security focus has shifted from keeping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stabiliz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Under the ethnic federalism & regional autonomy policy, the intensified political demand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Ethiopia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Keywords: Ethnic Politics; Relation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Ethnic Policy

A Study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British African Colonies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Huang Jinkuan / 71

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Britain began to gradu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value of African colonies.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e the colonial empi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egan to transform colon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developing African colonies. Driven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commodity agriculture was expanding rapidly in African colonies, a large number of white immigrants flocked to Africa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a large amount of high-quality land was occupied by immigrants,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ed towards single-product economy, land issues and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ssues wer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colonial rule has caused many problems, the root of these problems must be found from colonialism itself.

Keywords: Colonialis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frican Colonies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igeria's Tin Mines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Zhao Xian / 83

Abstract: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most African countrie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Nigeria is no exception. After Nigeria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British companies began